

往事如昨



《张郎休妻》剧照

丁香的头发三尺长

焦辰龙

小时候，就盼着过年！
过年好呀，过年不仅能吃好饭、穿新衣、放鞭炮，还能看戏呢！

那时，往往一迈进腊月的门槛，我们家附近的交通局、港务局、木帆社便开始排戏了，那欢快的锣鼓点、悠扬的乐曲声，使周边几条胡同的气氛骤然就热闹起来了。它分明是在提醒人们：哈！又快过年啦！

正月里演戏时，因为有许多道具要向老百姓借——跟张家借个包袱，跟李家借把扇子，跟王家借个托盘，跟吴家借个小锡壶……所以，邻舍本家们每天晚上都能得到一些赠送的戏票。那一张张油印的、盖着一个大红戳子的戏票，是大年正月里我们这些小孩子最爱。在对一出出传统戏曲的欣赏中，中国文化的思想性、艺术性，潜移默化地浸润着我们尚未成型的世界观，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真善美的种子。

上世纪50年代，中央戏剧学院邀请苏联专家来中国讲课。苏联专家接触了中国的戏曲之后，耸耸肩，把两手一摊，惊叹道：“你们请我们来讲课？——你们这是捧着金饭碗要饭！”中国戏曲是世界艺苑中的一朵奇葩。

1959年正月初九，天寒地冻，窗花绚烂；鹅毛大雪搅得天旋地转，犹如银马狂奔，玉龙飞舞。海员俱乐部二楼的大礼堂里，灯火通明，温暖如春，仙影飘飘，丝竹盈耳，交通局业余剧团正在演出吕剧《张郎休妻》。

我旁边的座位上坐着一个20多岁的男子，留着大背头，跷着二郎腿，脚蹬一双擦得贼亮的皮鞋，说话带点东县口音，看样子是从农村招上来的船员。

舞台上，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李海棠莲步轻移，香气袭人，珠帘一挑，春光乍泄，犹如梨花一枝春带雨，又似红杏枝头春意闹。只见张郎的一双眼睛都亮了！

李海棠热情地把张郎迎进闺房，搔首弄姿，欲说还羞。张郎浑身的骨头都酥了，像一根青藤似地荡来荡去，围着盛开的海棠花打转……他终于把她的削肩蜂腰揽入怀中。她云鬓斜倚，眉目传情，娇喘细细……

这时，就见坐在我身旁的“大背头”的眼睛也亮了，木头条椅被他压得吱吱作响。

“嘿嘿……”他垂涎欲滴地笑道，“遇到这么漂亮的小娘们，谁不动心呀！”

舞台上，张郎也禁不住李海棠的诱惑，抛弃贤惠的发妻葛丁香，娶了李海棠。

几年之后，张郎的家底被好吃懒做的李海棠败坏净尽，张郎也在一场大火中被烧瞎了双眼。李海棠把脸一变，不顾张郎跪在地上苦苦哀求，一脚把他蹬了个趔趄，扬长而去！

这时，坐在我旁边的“大背头”气得鼻子都歪了，骂道：“……落我手里非一刀宰了她！”

舞台上，葛丁香被张郎赶出家门之后，与一个住在寒窑里的范姓少年再结连理。夫妻俩在寒窑旁开荒种地，土里刨金，日子越过越红火。

瞎眼张郎沦为乞丐，沿街乞讨。有一天，他要饭来到了前妻葛丁香的门下。葛丁香又是哀怨又是怜悯，亲自上厨房给他下了一碗珍珠面，把一枚金戒指放在碗里，希望他能少受点儿饥寒之苦。

张郎把金戒指喝到嘴里之后，以为是石子硌牙，竟然把它吐到了地上。

葛丁香又拔下自己的一根头发，缠一缠，放到碗里。张郎喝到那根头发之后，缓缓伸开，方知站在他面前的是何许人也。悠悠长发，缠绵余香，只有丁香才有呀！他羞愧难当，唱道：

丁香的头发三尺长，

羞杀我这负心郎。
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——
一头撞死在锅台上！

这时，坐在我身边的“大背头”竟然抽抽搭搭地哭起来了，涕泗横流。一旁的人看到他那样子，都捂着嘴偷偷地笑。

散场后往剧场外走时，“大背头”若有所悟地说道：“唉！……还是包公说得对：糟糠之妻不下堂呀！”

回家之后，我把《张郎休妻》的故事讲给奶奶听，奶奶却说：“张郎以后成神了！”又指着贴在锅台后面的灶马说：“那灶王爷就是张郎。”

原来，在民间故事中，张郎乞讨到丁香家之后，思前想后，无地自容，一头钻到锅灶里烧死了。丁香念及旧情，就请人画了一张张郎的画像，贴在灶头上，烧香供奉。香烟袅袅，直上天庭。玉皇大帝知道这件事之后，就封张郎为灶神。

张郎休妻和灶王爷的故事现在听起来有些搞笑，细细琢磨又觉得其中颇有几分意味。人们同情、喜爱丁香，因为她能够忍辱负重、置之死地而后生，表现了中国妇女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；见到落魄的张郎之后，她也没有落井下石，反而以德报怨，暗中接济他，体现出中国人善良厚道的美德。从张郎羽化成仙的结局，可以看出中国人的宽容与大度，允许人犯错误，允许人改正错误。张郎为了惩罚自己，羞而投入熊熊燃烧的灶火中。老天爷相信他知廉耻，能够痛改前非，于是就封他为灶神，让其监视人间善恶，年年回报上苍。

其实，所谓的老天爷就是人民群众，所有的民间故事都是人民群众创作的。人民群众是通情达理的，他们对犯错误的人不主张一棍子打死，而是主张给其出路，让其改正错误，重做新人。表现好的还可以安排他干一定的领导工作，例如张郎。当然，这也是人民群众对“领导”的一种美好愿望，希望他们能够不辜负老百姓的殷切期望，为官一世，造福一方。

原上海人艺院长、著名导演黄佐临先生把中国戏曲命名为“梅兰芳体系”，将其与世界上著名的斯坦尼体系、布莱希特体系相提并论。他认为：这三大体系的区别是，斯坦尼体系极力要在演员和观众之间立起一堵墙（第四堵墙），布莱希特体系极力要拆除这堵墙，而对于梅兰芳体系来说，这堵墙根本就不存在！

这话说得好，有形而上的象征意义。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，老辈儿一些舞台的台柱子上就镌刻着这样一副对联：

舞台小世界，
世界大舞台。

在人生的大舞台上，我们人人都是观众，同时也都是演员。在舞台上扮演张郎的男子，在生活中也许是一个与妻子琴瑟和鸣的好丈夫；扮演李海棠的女子，在生活中也许是一个举案齐眉的小孟光；看戏时坐在我旁边的“大背头”，也许当时正和农村的发妻闹离婚，隔着戏里的张郎只有一步之遥了，一出《张郎休妻》，把他从悬崖边上拉了回来。

这些年来，由于各种原因，我很少进剧场了。晚饭之后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看看电视，倒也其乐融融。可是，三五个人面对光影变幻的电视，与千百人共同欣赏一场舞台演出，其气氛、感觉、收获，不可同日而语。

“歌未竟，东方白。”抚今追昔，我怀念自己美丽工作着的中年，激情燃烧的青年，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少年，更怀念无忧无虑、盼望着过年的童年。

童年，是人生的早晨。

忆昔少年读书时

王吉永

—

上世纪50年代，我在烟台搬运工人子女小学读五年级时，刚从师范院校毕业的刘宝玲老师担任我们的班主任。用她的话说，这是她第一次走上讲台，也是第一次担任班主任。当时，刘老师才18岁，比班上的大同学只大两三岁。

校园向北不远是芝罘湾。当年芝罘湾因多年淤泥沉积，沿岸水很浅，特别是西南河入海口以东那片海，退潮时能退出一大片陆地，聚集起很多赶海的人来挖大黑皮蛤。搬运工人子女小学地理位置得天独厚，若是赶上下午四五点钟退潮，我们班学生最后那节课活动课去赶海的现象屡禁不止。

刘老师没把这件事告诉校长，而是用成立“图书角”的办法吸引大家。她让全班同学每人带两三本故事书，成立了“图书角”。同学们推选我担任负责人，可以找我借书，借期最多一周。每天最后一节活动课为阅读、朗诵课，上半节课阅读，下半节课把看过的故事用普通话讲述给全班同学听，每个同学都不准缺课。还别说，刘老师这一招真灵，不仅形成了全班读书的好风气，还提高了同学们说普通话的水平，班级学习成绩也得到很大提升。对我而言，近水楼台，一下子拥有更多的书可以看，不但解决了没有钱买课外书的困境，而且久而久之，养成了爱看书的好习惯。

—

看书要有看书的条件，起码要有一个独立的空间。我朝思暮想，若有一间小书房那该多好啊！可是，家中人口多，住房并不宽绰，唯一可以利用的就是那间平日存放柴草杂物的小厢屋。然而，小厢屋的柴草放到哪儿？一张床20多元钱从哪里来？小厢屋没有电怎么办？

为了早日拥有理想中的书房，我一直在谋划着解决这些困难。机会终于来了，在我小升初统考后的那个暑假，没有学习压力，我利用这段时间爬到小棚子顶上，把四片碎瓦撤下来，把我在街上捡的几片小黑瓦放上，并在瓦下面垫了些黄泥。然后，我把小厢屋的柴草、杂物蚂蚁搬家一般一一搬进了小棚子。小厢屋方方正正，尽管只有5平方米，但清理完后还是挺宽敞的。我安上一个一米多长的书桌，又设计了一铺一米多宽的小炕，感觉屋里的活动余地仍然挺大的。

妈妈请她单位的赵师傅帮忙，垒了一铺长两米一、宽一米一的小炕，下面有炕洞可以烧柴草热炕，睡觉的问题解决了。最后一个困难就是照明问题，爸爸和我都不懂电工，好在暂时可以用煤油灯照明，读书也不耽误。

1959年我上初中三年级，一批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书，如《苦菜花》《红日》《青春之歌》《林海雪原》等长篇小说相继出版，每本都是1元左右，深受中学生喜欢。然而，父母每月微薄的工资维持八口之家的生活已是不易，哪有多余的

钱给我买课外书。班上能买得起课外书的同学寥寥无几，僧多粥少，大家便互相借阅，常常是一本五六百页的故事书，最多看三天就要转交给下一位同学。

于是，我把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凑：每天最后两节活动课，必须做完当天的作业。我还一度把走路的时间也用于看书。那时马路上车很少，在人行道上边走边看书，一点儿也不用担心被车撞着，但有几次我差点撞上了大树。

回家匆匆吃完晚饭后，我就立马回到自己的小厢屋里，坐在被窝里开夜车看课外书，直看到昏昏欲睡方才罢休。

—

用着煤油灯，连续多日开夜车看书，我终于闯祸了。一天夜里，我在睡梦中被浓烟呛醒，只见煤油灯不知什么时候被我碰翻，煤油全部洒在棉被上并引着了火，靠桌子近的那个被角已经烧了一个蒲扇大的洞，火苗还在继续蔓延，书房里充满焦糊味儿的浓烟。我一个高儿从床上跳出去，从院子里的矮水缸里舀了一脸盆水，用湿透的毛巾把那些火苗全部按灭，并把门开到最大，用扇子扇风，只怕妈妈发现我把被子烧了。当年置床新被子可真不容易，我那床被子是爸妈觉得厢屋太冷特意送我的厚被子，还是找人把棉花弹了，拆洗后专门给我做的。

思来想去，我把着火的地方仔细检查了一遍，确定不可能死灰复燃后，再用干毛巾把用水浸过的地方尽量吸干。然后，我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，把有窟窿那头叠在里面。炕面、地面和桌面也都收拾得干干净净，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。为了跑气味，门一直开着，冬天的寒风吹进厢屋里，一点热乎的东西都没有，我呆呆地坐等天亮。

白天一整天，我心中都忐忑不安，充满负罪感。晚上没有回家，我躲进了学生食堂的柴草棚里猫着。那一夜又冷又怕，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。不料，第二天一早，我就看见妈妈站在距教室不远的地方四处张望。躲避已来不及，我索性硬着头皮迎上去，准备接受惩罚。没想到妈妈并没打我，只是焦急地问：“你昨晚去哪里了？我们找了你半宿……”

两个月后，我读初三下学期，物理课学“电学”。我吃过没有电的苦头，心想一定要学好电学，自己给小厢屋拉上电。这种主观能动性促使我对电学特别感兴趣，喜欢做实验、设计电路、自己动手操作。学习完毕，我利用一个周末到就近的志达五交化商店，花了两元多钱买了灯口、灯泡、三米双股软线、拉线开关、电工胶布等。回家后我立马动工，不到中午就安装完毕。当电灯亮起来的那一刻，我心中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！

从此，我告别了煤油灯，再也不用在昏暗的光线下看书了，再也不用担心用煤油灯看书惹祸了，心中油然生出一种长大了的感觉。